



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地带,河网纵横,因此到处可见各种不同层次、不同水量的大小河涌。而由于临近珠江入海口,这些河涌都可在很短的流程内通往大海。佛山人常常把“涌”称为“海”,不知内情的人会觉得非常奇怪。其实,这些水涌从某种意义上确可以称之为“海”,因为由于靠近大海,当大海涨潮的时候,海水倒灌,这水涌里的水常常就是海里的咸水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,将佛山传统文化称为“河涌文化”,可以非常精确地描述这个地方的文化特点。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用当地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描述其独特的文化,是一种通常的话语方式,而且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启发,如把中国传统的中原文化称为“黄色文明”或“黄土地文化”,把欧洲文化称为“蓝色文明”和“海洋文化”等等。因此,把佛山传统文化称为“河涌文化”,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。

由于河涌靠近大海,从海水的纯粹性角度,我们可以说河涌文化的确也是一种海洋文化,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把珠江三角洲称为“蓝色文明”的缘故。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,佛山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点,和欧洲文化的确存在着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。然而,我们必须指出的是,河涌就是河涌,它无论如何都不是大海。尽管它具备大海的某些特点,却从根本上缺乏大海的博大和包容性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清楚地知道佛山毕竟不是欧洲。

所以,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评价佛山传统的河涌文化。过高地评价她,甚至满足于她的小城味道,是绝对不利于她的现代化进程的。河涌的格局就是一个“小”字,而一个现代化的佛山,首先要克服和超越的就是这个“小”字。必须要有文化意识上的大思维、大气魄,才能面对现代化提出的挑战。大佛山的“大”字是什么意思呢?有许多有形的指标,而一个文化上的无形的指标,就应该是“有容乃大”,要有海纳百川的魄力,要有大海一般的包容性。一个现代化的佛山必须具备足够的融合力和辐射力,而实现强大的融合力和辐射力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强大的包容性。佛山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性的文化,而如何突破纯粹性,实现文化的包容性,是摆在佛山人面前的一大课题。

(作者系广东省文联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1952年起,广州中山大学由石牌地区迁至康乐村,与原来位于该址的岭南大学合并(其中工科部分则另行合并成立华南工学院于石牌),继续使用中山大学校名,同时取消“岭南大学”校名,这是为了适应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作为广东规模最大、成立较早的私立大学——“岭南大学”,曾经在中国教育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这当中,对岭南大学贡献最大的,当推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。

钟荣光(1866~1942),字惺可,与孙中山先生同年同乡,原籍香山县(今中山市)小榄镇人。17岁中秀才,从岭南国学名家吴道镒举人授业,24岁中副榜,在广州设“大馆”(是专修文学的高级学舍,开办及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)授徒,29岁中举人。这时,他已经名驰文苑,所作八股制艺文章,常在流行的《课艺日新》、《文坛帜》上发表。时值清政府在甲午战役中惨败,他蒿目时艰,无从用世,便与同榜举人江孔殷(广州人称为江太史——“江虾”),流连风月,寄兴诗酒。而在1906年参加兴中会后,他却尽改自我陶醉的灯红酒绿生涯,剪去辫子,脱去长马褂,遣散婢妾,还资助她们学医就业。此后创办《博闻报》、《安雅报》、《可报》等,公开抨击时弊,大力鼓吹革命,最后尽瘁于岭南大学的教育事业(其中曾一度任广东教育司长,国民政府侨务局长)。

本来,钟荣光于1899年已在香港道济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,但这并无损于他作为革命党人的雄心壮志。在1907年,他赴日本出席“世界基督徒学生大会”。回国时途经天津,被人告密,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拘捕。粤籍官绅钟锡璜、江孔殷两个举人,还有同乡唐绍仪(时任天津海关道员)、陈昭常(时任锦山海关道员)等,出面营救,历时五十多天始获释。释放之日,警局提调某,亦是科甲出身,闻知钟为南中文豪,提议两人各拈一题,分作八股文“开讲”一段,以资纪念,实欲试钟的才华。题为《中庸》二句:“素夷狄行乎夷狄,素患难行乎患难。”钟先拈得下句,刚好切合自己此时此地的“铁窗风味”,文思泉涌,一挥而就,先行交卷,该提调随后完卷,捧读钟文,长揖致敬,佩服诸多,称钟先生不愧是“名下无虚士”,即以大礼送至天津海关道,备受厚待而



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

■ 欧安年

后南返。

从 1888 年起,美国教会势力在广州的沙基金利埠(今六二三路)办有教会学校——格致书院(即岭南大学前身)。十年后,即 1898 年,钟荣光以名举人身份,应聘担任汉文总教习。随后,于 1917 年当上学校副监督,成了学校当中华人方面的最高负责人。与此同时,他又在该校随班学习英语、数理化,与学生同时上课,以举人之尊而在预备班毕业,这时他已经 39 岁了。而他在年将半百时,又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旁听生,选修教育学。他以早登科场的风流才子,成为勤学不辍、自甘清苦的教育家(长期吸的是手卷廉价烟丝),传为佳话。

格致书院于 1900 年改名为岭南学堂,1904 年迁至康乐村,1912 年更名为岭南学校,1914 年改为岭南文理科大学,这是岭南大学的升格。1918 年夏季,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有三人接受文学士学位。1917 年增办农科。此后,工、商、医、蚕丝学院次第成立,成为多科性的完全综合大学。校园中的建筑物,著名的有:荣光堂、爪哇堂、陆佑堂、怀士堂、张弼士堂、陈嘉庚堂、尧棠堂、胡文虎堂,还有大批新型校舍。在扩建过程中,除了美国教会投资外,钟荣光多次出国筹款,依靠华侨资助。学校招生对象面向港澳、南洋和欧美华侨,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和越南、新加坡等地,都办有岭南分校(中、小学),在岭南大学校址内又专设华侨子弟学校,华侨均以送子弟回国就读该校为“最佳选择”,乐于襄助。

从 1926 年起,全国掀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。是年 11 月,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,规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办理,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设办大学。岭南大学董事局为此决定在中国设立校董会,校董 19 人,其中 15 人为中国人(钟荣光、金曾澄、孙科、林逸民、廖奉恩等),4 人为美国人。原设在纽约的董事局则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

委员会,以美国人包令留为主任,兼任岭南大学的历史政治系主任。1927 年 1 月,正式推举钟荣光为校董会主席兼校长,这是首任华人校长。李应林为副校长,原校董会主席美国人香雅各退居为顾问。据当时的岭南大学校刊报道:“外国人在中国设立之大学,其将主权完全交由中国人接管者,实以本校开其先河,故举行交代典礼时,甚觉隆重。是日上午,大雨如注,正午又为省政府改组成立、委员行就职礼之期,而各界来宾,仍是座为之满,洵盛况也。”此后,岭南大学的经济来源是多方面的,下设三个基金委员会,分别为美国、华侨、同学基金会,经费还有来自教育部、省政府的补助。钟荣光从此更倾其毕生心血精力,继续主持校政十多年(从 1937 年起改任荣誉校长终身,由李应林担任校长),1942 年 1 月,因心脏病于香港逝世。

钟在 1937 年预作自挽联,传诵一时:

三十年科举沉迷,自从知罪悔改以来,革过命,无党勋;作过官,无政绩;留过学,无文凭;才力总后人,唯一事工,尽瘁岭南至死。

两半球舟车习惯,但以任务完成为乐,不私财,有日用;不养子,有徒众;不求名,有记述;灵魂乃真我,几多磨炼,荣归基督永生。

钟自命是典型的基督信徒。无子,有一女。

钟荣光和孙中山三代都有较深关系。当陈炯明叛乱,孙中山蒙难在“永丰”舰时,曾到岭南大学小住,钟荣光百计掩护,使孙和宋庆龄安然度过。孙中山先生曾三度到岭南大学视察讲演,还捐资兴办农学院。1923 年,孙在“怀士堂”讲话,“要做大事,不要做大官”这句名言,至今仍刻在门前柱子上。孙科任铁道部长时,也曾赞助款项兴办工学院,还专门安排两个儿子在岭南大学附中就读。

岭南大学(包括附中及其前身)的学生



胡适与陈济棠在广州的较量

■ 陈 刀

1935年1月,胡适来到了广州。

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,曾在当时的青年中留下很大影响,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,来到广州,却受到当时主政广东的“南天王”——陈济棠的冷遇,使颇负盛名的胡适广州之行,显得灰溜溜的。

1935年元旦,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,从上海乘船南下,4日早晨便到了香港。这是他第一次南游,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(胡适一生中得过35个名誉博士头衔),故他心情特别好。到岸后受到香港港督、华侨教育会主席陈铁一等人的欢迎。胡适喜欢演说,熟悉他的朋友笑他爱“卖膏药”,在香港五天,他作了近

十次的演讲。1月6日,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,胡适作了半个小时题为《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》的演讲,说着说着,就说到广州了。他说道:“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,主张用古文,不但用古文,而且还提倡读经书,我真不懂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,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,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?”

胡适在港的活动,穗港两地的报纸多有报道,他的那番讲话,使广东当局大为不满,因为读经是陈济棠提倡的,这无疑给胡适下一站的广州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此次南下,胡适原已托吴康代为安排在广州的活动,准备到几家大学里进行演讲;中山大学已预早发出布告,停课两天,让学生听

当中,不少是有影响的历史人物。如格致书院开课之始,第一名投考入学的,乃是“革命四大寇”之一的陈少白(其余三人为孙中山、尤烈、杨鹤龄)。又如1900年谋炸两广总督而殉难的先烈史坚如,还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(被钟荣光隆重敦聘为银乐队指挥),画家高剑父、司徒乔,革命烈士李少白,近代革命家廖承志和廖梦醒兄妹,日本诗人草野平心。至于现在华南各高等院校、科研单位的业务骨干,出身钟师门下者大不乏人(岭南大学成立以来,毕业生达1340人)。著名的广东文献专家——女教授冼玉清,蒙钟荣光赏识安排,一面在岭南大学就读,一面兼任附中的文史教员,得以解决求学费用。后来又承推荐任岭南大学文物馆长。钟还破格拨校园“九家村”内的一座房子供她定居,名为碧琅环馆,良好的环境有助她的学术成就。

岭南大学的教育特色和严格校规,都和钟校长的从严治学精神有关。如规定学生每日下午必须在户外运动一小时,由散步以至剧烈运动。还有假期读书、室外实习、旅行研究(老师领队至各工厂或特定地

点参观)及中、英文演讲比赛。附中的学生生活实行军事管理,晨夕必有体操。学生军之编制、操法、号令,均按美国的《陆军操典》。大学生则另立“义勇队”,颁发新式来福枪,操演训练与陆军无异。校规方面,凡有不道德者,立即开除学籍,如考试舞弊,视为最不诚实之丑闻。凡上课、自修、体操,有迟到或未请准假而缺席者,均予记过。在宿舍内私藏食物者记过。内务不整者记过。私藏火柴者被视为抽烟记过。体操时制服不整者记过。

中山大学现在的贵宾接待室,便是当年钟校长的故居——黑石屋。岭南大学“校园风物”——木瓜和橄榄树,前者已渐趋式微,后者则时有所见,均为当年钟师的“甘棠遗爱”。1952年,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院士到校参观,了解到当年岭南大学的规模设置一应俱全,甚至还有校警队、岭南坟场等,便笑对陪同参观的朱光市长说:“你是市长,这里的校长也是市长呢!”

(作者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)